

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意愿与能力:一个经验检验

韩洪云,梁海兵,郑洁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已有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研究因未有效区分转移意愿与能力的差异而致实证分析存在样本选择偏误。本研究从转移意愿和能力两个维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深入甄别的同时,运用实地调研数据定量研究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意愿与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年龄是影响“有效转移”“潜在转移”和“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意愿与能力的重要因素;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农村已婚女性的工作预期而致其就业难度增加进而降低了其就业转移意愿。职业培训对农村已婚女性实现“有效转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总人数对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具有显著的家庭“跟随”效应。村庄特征和子女教育是影响农村已婚女性“有效转移”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农村已婚女性;转移意愿;转移能力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5-0009-08

一、引言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以及社会经济效率改善(郭力等,2011)。^[1]农民工家庭迁移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步骤与要求(李强,2012),^[2]但受城市就业机会与自身人力资本的制约,农村进城务工劳动力就业缺乏稳定性(马瑞等,2011)^[3];同时中国转型期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劳动力市场分隔和性别分化,并损害了农村女性的社会地位(Fan,2003)^[4]。近年来进城务工女性农民工增幅高于男性,农村女性正告别祖辈习惯性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就业方式,逐步融入城市(肖云,2005)。^[5]她们更多地为经济独立而工作,更加理性地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分配时间(罗芳,2011)。^[6]农村女性外出务工不仅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独立意识、生活习惯等的转变(Zhang et al.,2004)。^[7]

农村女性劳动力,尤其是已婚女性劳动力,就业转移仍面临诸多约束:一方面,农村已婚女性劳

动力必须承担传统的家庭责任,更加偏好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家庭经济压力又会激励已婚女性农民工寻求就业转移(黄宁阳、黎梦,2010)。^[8]由于特殊的家庭角色,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对于农业人口城市转移、促进地区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刘宁,2008)。^[9]本研究从意愿和能力两个维度对农村已婚女性转移行为展开微观分析,以探寻“潜在转移”“隐蔽转移”与“有效转移”的决定因素,以期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和为中国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化迁移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从转移意愿和转移能力两个维度界定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的理论框架,并对样本数据展开描述性分析;第三部分实证结果分析,实证分析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转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在转移到有效转移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第四部分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收稿日期:2013-06-21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3-09-12

作者简介:韩洪云,女,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

梁海兵,男,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民工就业。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1. 农村女性就业转移决定因素

(1) 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的意愿与能力

已有的劳动力转移意愿研究表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所处的环境因素(包括交通条件、就业机会等)与转移意愿之间显著相关(陈欣欣、黄祖辉,2003;盛来运,2007;黄国华,2009;丁守海,2011;闫春,2012)。^[10-14]农户的迁移决策受到户主的年龄、户主的职业类型、家庭是否有学龄儿童、人均耕地面积、交通状况、外出劳动力比例、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吴秀敏等,2005)。^[15]黄宁阳、黎梦(2010)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年龄、家庭外出劳动力数量对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打工收入越高、打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越强;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跨省流动的影响呈“倒U型”。^[8]家庭化迁移会减少女性居家就业和外出就业概率,降低女性就业水平。虽然男女教育程度的差异具有一定影响,女性在职业发展上与男性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家庭时间配置、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等因素。

给定转移意愿条件下的转移能力是转移行为发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农村女性劳动力承担着过多的家务劳动,并缺乏社会资源以支持其职业发展而比男性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宋月萍,2007)^[16],全部外出农民工男性占66.3%,女性占33.7%(盛运来,2007)。^[11]家庭是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能力的重要因素。家务劳动、土地耕作和低教育程度,降低了农村女性非农产业转移能力(高小贤,1994)。^[17]文化程度越高,其外出就业的意愿越强烈,转移能力也越强;拥有一定技能的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有更大的主动性与实现转移的可能性(赵卫红等,2012)。^[18]受教育水平较高、有职业技能、家庭耕地少、居住地在偏远乡村的已婚女性更倾向跨省流动,但婚姻状况对转移意愿影响不确定(郭力等,2011)。^[1]侯红娅等(2004)^[19]则认为未婚者较已婚者总体的进城意愿更强烈,年龄增长不仅降低了其就业转移的意愿,而且削弱了其外出实现成功就业的能力。

(2) 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的家庭决策机制

新家庭经济理论将家庭视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统一体,家庭消费品的价值不再仅仅由市场

价格决定,同时取决于家庭生产所消耗的劳动时间的影子价格,为分析双重迁移的女性就业决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女性作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家庭总体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其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就成为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保留工资。与单独外出不同的是,家庭化迁移能够将很多生活成本家庭内部化,即通过家务劳动来节省消费性支出。与从市场上获得的工资水平相比,当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更高时,女性会放弃就业选择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李强,2012)。^[2]由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存在,农村已婚女性更倾向于选择能实现“双赢”的就业途径,既照顾家庭又从事非农就业以增加家庭收入。家庭和城乡迁移同时发生的“双重迁移”,对女性“双重迁移”引发不同以往的就业决策,并改变了农民工家庭的生活状态(李强,2012)。^[2]一些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能够提供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已婚女性外出就业较少,而一些传统农业村庄非农产业部门的吸纳能力相对不足,已婚女性转移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外出就业,考虑到外出的成本,更多的已婚女性选择留守家庭,从事农业生产或处理家务(赵卫红等,2012)。^[18]Roberts(2002)考察了来上海务工的女性劳动力转移决策:是临时的“漂族(floaters)”还是潜在的“定居者(settlers)”。研究发现,女性的婚姻状况是女性转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将近1/3的农村女性是跟随丈夫一起“社会转移(social migration)”,并且她们是中国转型期从临时转移到定居在大城市的“先锋(vanguard)”。^[20]

虽然已有的研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意愿与能力决定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但由于未能对样本内部差异进行有效和合理的区别,样本选择偏误限制了已有实证研究结果对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就业转移行为的解释能力,难以为城镇化发展中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同时家庭化迁移的决策机制在相关研究中,尤其是经济模型中并未能得到较好的诠释。本文拟从农村劳动力从转移意愿和转移能力两个维度,实证研究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式转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尤其分析农村已婚女性“潜在转移”“隐蔽转移”和“有效转移”之间的就业转移意愿与能力的差异及其相互过渡的决定因素。

2. 模型选择

农村劳动力转移需求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具有意愿;二是具备能力。如果将转移行为根据转移意愿与转移能力两个维度进行划分,那么转移人口可以细分为:既具有转移意愿又具备转移能力的“有效转移(effective migration)”人口;二是具有转移意愿但无转移能力的“潜在转移(potential migration)”人口;三是无转移意愿但具备转移能力的“隐蔽转移(private migration)”人口;四是既无转移意愿也无转移能力的“无转移”需求人口。

本研究拟采用无序四分类 Logit 模型来分析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转移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农村已婚女性转移需求类型为被解释变量,其中“无转移”赋值为 4,相应的概率为 P_4 ;“隐蔽转移”赋值为 3,相应的概率为 P_3 ;“潜在转移”赋值为 2,相应的概率为 P_2 ;“有效转移”赋值为 1,相应的概率为 P_1 。 $P_1+P_2+P_3+P_4=1$ 。

尽管根据劳动力就业转移意愿与能力两个指标确定的劳动力就业转移趋势存在 12 种转换可能,但由于劳动力就业转移能力的客观性,劳动力就业转移趋势具有如下 6 种可能的转换,具体为:

①无转移→有效转移

$$LogitP_{41}=Ln\left[\frac{P(Y=1|X)}{P(Y=4|X)}\right]=\alpha_1+\beta_{11}X_1+\cdots+\beta_{1n}X_n$$

②无转移→潜在转移

$$LogitP_{42}=Ln\left[\frac{P(Y=2|X)}{P(Y=4|X)}\right]=\alpha_2+\beta_{21}X_1+\cdots+\beta_{2n}X_n$$

③无转移→隐蔽转移

$$LogitP_{43}=Ln\left[\frac{P(Y=3|X)}{P(Y=4|X)}\right]=\alpha_3+\beta_{31}X_1+\cdots+\beta_{3n}X_n$$

④隐蔽转移→有效转移

$$LogitP_{31}=Ln\left[\frac{P(Y=1|X)}{P(Y=3|X)}\right]=\alpha_4+\beta_{41}X_1+\cdots+\beta_{4n}X_n$$

⑤隐蔽转移→潜在转移

$$LogitP_{32}=Ln\left[\frac{P(Y=2|X)}{P(Y=3|X)}\right]=\alpha_5+\beta_{51}X_1+\cdots+\beta_{5n}X_n$$

⑥潜在转移→有效转移

$$LogitP_{21}=Ln\left[\frac{P(Y=1|X)}{P(Y=2|X)}\right]=\alpha_6+\beta_{61}X_1+\cdots+\beta_{6n}X_n$$

其中, P 表示不同转移需求类型的概率, $\alpha_i(i=1,2,3)$ 为系数, $X_i(i=1,\cdots,n)$ 为解释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环境特征等变量。变量选择及参考来源见表 1。

表 1 变量选择及其解释说明

变量分类	具体变量及解释
个人特征	年龄(岁);受教育年限(年);职业技能(有=1,无=0);职业培训(有=1,无=0)
家庭特征	耕地面积(亩);依存人数;家庭外出务工人员;丈夫务工(务工=1,没务工=0);学龄前孩子数量;在读孩子(有=1,无=0)
环境特征	村企业数;村与乡镇距离(里);通车数量(次);交通成本(元/次)

3. 数据来源

为验证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就业转移行为及其差异,笔者于 2012 年 2 月至 4 月在江西省浮梁县对农村已婚女性转移需求情况展开入户调查。江西省是我国的人口和农业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截至 2010 年,全省农村人口比例为 55.94%。相对于全国 50.05% 的农村人口比例,江西省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为深入分析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就业转移决定因素,在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要素的基础上,按照乡镇

经济综合实力分层抽取了江西省浮梁县的三龙镇、洪源镇、寿安镇、鹅湖镇、经公桥镇、王港乡及勒功乡 7 个乡镇所辖的 20 个行政村作为调查点,并按照乡镇总户数 1% 的比例对农村已婚女性随机抽样调查。

调查采用入户访谈的形式,总共发放问卷 350 份,剔除数据不完整等问卷,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329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4%。样本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样本分布情况表

务工类别	三龙镇	洪源镇	寿安镇	鹅湖镇	经公桥镇	王港乡	勒功乡	累计
未外出务工	16	17	36	28	16	10	10	133
外出务工	22	23	56	42	24	17	12	196
总样本数	38	40	92	70	40	27	22	329

在问卷调研时对调研对象转移行为进行完备分类,包括外出务工人员 and 未外出务工人员,尤其关注未转移农村劳动力,通过问题设置区别其不同的转移行为类型。对于未外出务工的样本提出的问题是:您没有外出务工的原因属于以下哪种情

况?【A】从未外出务工,也没有外出务工的想法;【B】有外出务工的想法,但找不到就业机会;【C】有外出务工的想法,也获取一些就业机会,但自己条件达不到工作要求;【D】有外出务工的想法,也获取一些就业机会,但自己对工作不满意;【E】以

前外出务工,但现在返乡发展。

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及调研对象意愿与能力差异,本文对已外出务工的调研对象直接归入“有效转移”,回答 A 的纳入“无转移需求”,回答 B、C、D 的归为“潜在转移”,而回答 E 的则纳入“隐蔽转移”。在 329 份有效问卷中,“有效转移”样本是 196,“潜在转移”样本为 23,“隐蔽转移”样本为 63,“无转移需求”样本为 47。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 SPSS16.0 软件,实证分析了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意愿与能力决定因素,其结果报告详见表 3 和表 4。

表 3 农村已婚女性转移意愿决定因素

变量	无转移→有效转移			无转移→潜在转移			无转移→隐蔽转移		
	B	Sig.	Exp(B)	B	Sig.	Exp(B)	B	Sig.	Exp(B)
截距	10.282	0.001		14.842	0.000		10.974	0.000	
年龄	-0.154***	0.004	0.857	-0.270***	0.000	0.764	-0.128***	0.007	0.880
受教育年限	-0.243*	0.080	0.784	-0.334*	0.054	0.716	-0.264**	0.029	0.768
耕地面积	-0.051	0.408	0.950	0.047	0.300	1.048	-0.015	0.685	0.986
家庭外出务工总人数	2.842***	0.000	17.158	-0.359	0.606	0.699	0.376	0.394	1.456
学龄前孩子数	-0.248	0.746	0.780	-1.357	0.120	0.258	-0.469	0.452	0.626
村与乡镇距离	-0.114	0.284	0.892	-0.236*	0.084	0.790	-0.167*	0.073	0.846
村企业数	-0.539***	0.000	0.583	-0.354***	0.005	0.702	-0.111***	0.009	0.895
通车数量	-0.216**	0.011	0.805	-0.309***	0.004	0.734	-0.226**	0.013	0.798
交通成本	1.165*	0.059	3.205	1.797***	0.005	6.033	0.962	0.114	2.617
依存人口数	0.024	0.952	1.024	-0.006	0.989	0.994	-0.273	0.425	0.761
职业技能 (对照组:无技能)	0.052	0.943	1.053	0.424	0.645	1.528	0.430	0.489	1.537
职业培训 (对照组:无培训)	-1.610**	0.021	0.200	0.183	0.834	1.201	-1.171**	0.046	0.310
丈夫务工 (对照组:无外出)	-1.151	0.224	0.316	-1.624	0.190	0.197	-1.422	0.106	0.241
孩子在读 (对照组:无在读)	-2.155***	0.006	0.116	-1.306	0.139	0.271	-1.190*	0.072	0.304

注:*** $P<0.01$,** $P<0.05$,* $P<0.1$ 。下表同理。

表 4 农村已婚女性转移能力决定因素

变量	无转移→有效转移			无转移→潜在转移			无转移→隐蔽转移		
	B	Sig.	Exp(B)	B	Sig.	Exp(B)	B	Sig.	Exp(B)
截距	-0.692	0.760		3.867	0.233		-4.560	0.192	
年龄	-0.026	0.518	0.974	-0.142**	0.025	0.868	0.115*	0.087	1.122
受教育年限	0.020	0.850	1.021	-0.070	0.641	0.932	0.091	0.568	1.095
耕地面积	-0.037	0.541	0.964	0.061	0.204	1.063	-0.098	0.155	0.907
家庭外出务工总人数	2.467***	0.000	11.786	-0.734	0.232	0.480	3.201***	0.000	24.557
学龄前孩子数	0.221	0.724	1.247	-0.888	0.240	0.412	1.108	0.188	3.030
村与乡镇距离	0.053	0.534	1.055	-0.069	0.570	0.933	0.122	0.330	1.130
村企业数	-0.428***	0.000	0.652	-0.243*	0.051	0.784	-0.185	0.223	0.831
通车数量	0.010	0.889	1.010	-0.083	0.357	0.920	0.093	0.266	1.097
交通成本	0.202	0.527	1.224	0.835**	0.024	2.305	-0.633**	0.029	0.531
依存人口数	0.297	0.351	1.345	0.267	0.499	1.306	0.030	0.945	1.030
职业技能 (对照组:无技能)	-0.378	0.536	0.686	-0.006	0.995	0.994	-0.372	0.681	0.689
职业培训 (对照组:无培训)	-0.439	0.418	0.645	1.354*	0.069	3.872	-1.793**	0.026	0.167
丈夫外出 (对照组:无外出)	0.271	0.671	1.312	-0.202	0.844	0.817	0.474	0.654	1.606
孩子在读 (对照组:无在读)	-0.965	0.114	0.381	-0.115	0.881	0.891	-0.850	0.320	0.427

表3给出了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从“无转移”向“有效转移”“潜在转移”和“隐蔽转移”的决定因素。表4则给出了给定转移意愿的条件下,农村已婚女性从“隐蔽转移”“潜在转移”向“有效转移”的关键决定因素。

以上以“无转移行为”农村已婚女性作为对照组的分析,能够给出从“无转移”向“潜在转移”、“隐蔽转移”到“有效转移”转换的农村已婚女性的转移意愿与能力差异的决定因素,这样的分析有助于解释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的决定因素,但无法回答哪些因素是农村已婚女性从“隐蔽转移”“潜在转移”至“有效转移”的决定因素。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分别以“潜在转移”和“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作为对照组,进行计量分析以把握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趋势决定因素,结果如表4所示。

1. 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就业转移决定因素

(1)个人特征对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年龄对实现向“有效转移”“潜在转移”和“隐蔽转移”转换的农村已婚女性转移决策均有显著负向影响。但从影响程度来看,转移意愿影响最强的是“隐蔽转移”组,然后是“潜在转移”组,最弱的是“有效转移”组。已实现就业转移的“有效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平均年龄为34.79岁(如表5所示),就业转移的工作经验积累部分地弥补了年龄导致的健康劣势;而有转移意愿但尚无转移能力的“潜在转移”农村已婚女性虽然平均年龄为32.83岁,其转移能力的缺失可能与家庭特征有关。同时,有转移能力但无转移意愿的“隐蔽

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平均年龄为36.02岁。“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虽具有最强的留城意愿,但随着外出务工时间的延长,年龄的增长,其身体状况与外出务工体能要求之间的差距,或者说工作单位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基本要求使之难以实现就业而被迫返乡谋生。在本研究的入户调研样本中,大多数返乡已婚女性都是因年龄过高而被企业拒之门外。

受教育年限分别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地负向影响农村已婚女性向“有效转移”“潜在转移”和“隐蔽转移”的转换。同时,从“有效转移”到“潜在转移”,再到“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的受教育年限依次降低。即表明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农村已婚女性的转移意愿越低,其原因可能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农村已婚女性的工作预期,反而使之难以寻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进而转移意愿降低。

是否掌握职业技能和是否具有职业培训经历是影响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能力的重要指标。实证结果表明,是否掌握职业技能并不显著影响农村已婚女性的转移需求,同时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对于“有效转移”和“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于“潜在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并不显著。从“有效转移”到“隐蔽转移”再到“潜在转移”,变量职业技能与职业培训的均值依次降低(如表5所示),这反映出低职业技能和职业培训的缺乏限制了农村已婚女性的就业转移能力。

表5 个人特征

	有效转移	潜在转移	隐蔽转移	无转移行为	总样本
年龄	34.79	32.83	36.02	39.34	35.53
受教育年限	7.24	7.22	6.95	7.06	7.16
职业技能 (1=“是”,0=“否”)	0.30(59)	0.17(4)	0.21(13)	0.23(11)	0.26(87)
职业培训 (1=“是”,0=“否”)	0.48(95)	0.17(4)	0.40(25)	0.21(10)	0.41(134)

注:①有效转移、潜在转移、隐蔽转移、无转移行为和样本总体的样本量分别为:196、23、63、47和329。②表中数值(除括号里数值外)均为相应转移类型的对应变量的均值。③括号内为样本频数。下表同此。

(2)家庭因素对农村已婚女性转移需求的影响

家庭特征更多地影响农村已婚女性的就业转移意愿。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耕地面积和依存人口数并不显著影响农村已婚女性转移行为,而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却对“有效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潜在转移”和“隐蔽转移”

农村已婚女性而言却并不显著。对于已经外出务工的“有效转移”农村已婚女性而言,家庭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其转移意愿越强烈,表明其转移行为具有显著的“跟随”效应(见表6)。“有效转移”者的家庭外出务工人数相对较多,平均每家约有2人,而“潜在转移”与“隐蔽转移”组家庭人均外出务工不足1人。同时,尽管其实证结果并不显著,

“潜在转移”与“隐蔽转移”组的家庭耕地面积和依

庭耕地面积和依存人口是影响农村已婚女性就业

存人口数都要高于“有效转移”样本水平,表明家

转移能力的重要因素。

表 6 家庭特征

	有效转移	潜在转移	隐蔽转移	无转移行为	总样本
耕地面积	3. 2260	6. 5043	4. 3317	6. 0766	4. 0742
依存人口数	1. 33	1. 61	1. 38	1. 19	1. 34
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数	2. 08	0. 35	0. 56	0. 38	1. 43

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同时维持家庭稳定也是大多数农村已婚女性考虑的重要问题。实证结果显示丈夫是否外出务工对农村已婚女性是否转移并无影响,而是否有在读孩子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效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决策对孩子而非与丈夫团聚给予更大权重。“有效转移”的农村已

婚女性在读孩子数量平均较其他两都要低(见表 7)。同时,学龄前孩子数对“有效转移”“潜在转移”和“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转移行为影响并不显著。以上分析综合表明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就业转移考虑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农村学龄前儿童的抚养问题,而是孩子的受教育问题。

表 7 家庭情感因素

	有效转移	潜在转移	隐蔽转移	无转移行为	总样本
丈夫务工 (1 = “是”, 0 = “否”)	0. 80(157)	0. 22(5)	0. 22(14)	0. 09(4)	0. 55(180)
孩子在读 (1 = “是”, 0 = “否”)	0. 64(121)	0. 70(16)	0. 68(43)	0. 53(25)	0. 64(205)
学龄前孩子总数	0. 26	0. 26	0. 24	0. 21	0. 25

(3) 村庄特征对农村已婚女性转移需求的影响

村庄特征在以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中较少考虑到,但村庄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户的转移需求(吴秀敏等,2005;陈欣欣、黄祖辉,2003)。^[5,10]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已经外出务工的“有效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村企业数和通车数量对其转移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交通成本则对其转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留守在农村的“潜在转移”和“隐蔽转移”的已婚女

性,村与乡镇距离、村企业数和通车数量都对其外出务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村与乡镇距离越远,村企业数越多,村通车数量越多,其转移意愿越弱(见表 8)。相比较“无转移行为”的农村已婚女性,“有效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的村庄交通特征要明显劣于“潜在转移”和“隐蔽转移”者,如村到乡镇距离平均最远与村里企业数平均最少促使她们具有较强的转移意愿,同时通车数量平均最多,交通成本平均不到 1 元钱,她们因而并不具有较大的转移能力压力。

表 8 村庄特征

	有效转移	潜在转移	隐蔽转移	无转移行为	总样本
村到乡镇距离	5. 095	4. 383	4. 406	5. 260	4. 937
村里企业数	0. 786	1. 348	3. 746	5. 383	2. 049
通车数量	3. 6327	2. 7826	1. 4603	4. 1277	3. 2280
交通成本	0. 9592	1. 0435	0. 3810	0. 5957	0. 8024

2. 农村已婚女性不同劳动力类型之间就业转换影响因素

以上主要考察了农村已婚女性转移就业的决定因素,而并未关注到单单具有转移能力或转移意愿的农村已婚女性转移就业的影响因素,即不同劳动力类型之间就业转换的影响因素。为此,研究分析继而转向表 4,分析结果表明:

对于“潜在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而言,相对于“有效转移”样本女性,她们缺乏的是转移能力。研究表明年龄和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总人数对其转移能

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交通成本和职业培训对其转移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潜在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平均年龄 32. 83 岁)向“有效转移”(平均年龄 34. 97 岁)的能力逐渐增强;家庭外出务工总人数越多,“潜在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的转移能力相对越强,这与前面分析的家庭“跟随”效应结论一致。交通成本越高,她们由“潜在转移”向“有效转移”的能力越弱。同时有职业培训经历的农村已婚女性较没有职业培训的过渡能力要弱,原因可能是行业间职业

培训(特殊企业资质)经验不通用造成的。

对于“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而言,相对于“有效转移”者,她们缺乏的是转移意愿。研究显示家庭外出务工总人数对其转移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企业数对其转移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村企业越多,就近务工不仅可以照顾家庭,而且可以节省较高的交通成本,因而,她们外出务工的转移意愿相对越弱。家庭外出务工总人数依然符合家庭“跟随”效应。

此外,年龄、村企业数、交通成本和职业培训是影响农村已婚女性从“隐蔽转移”向“潜在转移”转换的主要因素。由表3分析可知:“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更多的是因为年龄等因素被迫选择了返乡,她们实际具有留城的意愿,同时也具有外出务工的转移能力。故“隐蔽转移”向“潜在转移”转换更多地体现的是影响她们转移意愿的因素。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以经济学“需求”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从转移意愿和能力两个维度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的理论模型,并以江西省农村已婚女性调研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年龄是影响“有效转移”和“潜在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转移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是影响“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转移意愿而致其返乡回流发展的主要因素。(2)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可能提高了农村已婚女性的工作预期而致其就业困难。(3)是否掌握职业技能并不显著影响农村已婚女性的转移需求,但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对于“有效转移”和“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潜在转移”农村已婚女性的影响并不显著。(4)由于农村已婚女性“跟随”的转移特性,家庭外出务工总人数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村已婚女性向“有效转移”的转换。(5)当地经济环境,包括村庄交通特征和就业机会是影响农村已婚女性“有效转移”的重要因素,但村与乡镇距离和交通成本变量并不是其考虑的关键因素;而对于“潜在转移”和“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而言,村与乡镇距离、交通成本和通车数量是影响其实现“有效转移”的主要因素。(6)子女教育是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关键考虑因素,同时家务劳动和孩子教育也是农村已婚女性成为

“潜在转移”与“隐蔽转移”的主要原因。

转移能力或意愿是实现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由“潜在转移”“隐蔽转移”到“有效转移”的转变的关键。为此,第一,通过政策扶持促进“潜在转移”农村居民转移目标的实现。“潜在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因家庭原因,如孩子抚养、照顾老人、家务劳动等而未能有效转移,不仅影响了其家庭收入,而且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家庭迁移和社会稳定。第二,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已婚女性技术水平,改变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第三,改善农村教育设施,提高农村教育质量,降低家庭整体迁移的子女教育成本。越来越多的转移由以往的个人转移转向家庭式转移,转移的原因除了增加家庭收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外,更现实的原因是子女的教育问题。

参考文献:

[1]郭力,陈浩,曹亚.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背景下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地区6省的农户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1(6):45-54.

[2]李强.“双重迁移”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2(5):104-111.

[3]马瑞,等.农村进城就业人员的职业流动、城市变换和家属随同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1(1):2-11.

[4]Fan C Cindy.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ransitional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3,27(1):24-47.

[5]肖云.女性农民工就业现状及特点——对重庆市375名女性农民工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05(增刊):119-123.

[6]罗芳.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已婚女性的时间配置特点[J].湖北农业科学,2011(5):2156-2160.

[7]Zhang linxiu, Alan de brauw, Scott rozelle.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ts Gender Implication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4(15):230-247.

[8]黄宁阳,龚梦.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意愿的个体特征及家庭因素分析——基于农户调查的Logit回归模型[J].中国农村观察,2010(2):27-34.

[9]刘宁.中西部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及其路径选择[J].重庆社会科学,2008(9):24-27.

[10]陈欣欣,黄祖辉.经济发达地区就地转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3(5):33-39.

[11]盛来运.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7(3):2-16.

- [12] 黄国华. 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29个省市的经验数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9(4): 8-16.
- [13] 丁守海. 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5): 4-22。
- [14] 闫春. 农村嵌入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基于广西和贵州1611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12(4): 51-60.
- [15] 吴秀敏, 林坚, 刘万利. 城市化进程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迁移意愿分析——对成都市农户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05(4): 27-33.
- [16] 宋月萍. 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 审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J]. 经济学(季刊), 2007, 6(2): 629-654.
- [17] 高小贤. 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J]. 社会学研究, 1994(2): 83-90.
- [18] 赵红卫, 刘秀娟, 刘冬蕾. 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为例[J]. 农村经济, 2012(3): 118-121.
- [19] 候红娅, 杨晶, 李子奈.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 2004(7): 52-54.
- [20] Kenneth Roberts. Female Labor Migrants to Shanghai: Temporary “Floaters” or Potential Settlers?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2(36): 492-519.

(责任编辑: 宋雪飞)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tention and Capability of Rural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Transfer

HAN Hongyun, LIANG Haibing, ZHENG Jie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inadequate distinction of transfer intention and capability,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rural labor employment transfer are inflicted with the sampling bias. The study made a sufficient distinction in the rural labor transfer decision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transfer intention and capability, and delved empirically into the transfer intention and capability of rural married women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the survey dat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ag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employment transfer intention and capability of rural married women who engage in “effective transfer”, “potential transfer” and “hidden transfer”. Higher education level increased the employment expectation, and accordingly the employment difficulty and decreased the employment transfer intention on the part of rural married women. Vocational training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ffective transfer”. The aggregate number of the family migration labors had a remarkable “following” effect on the employment transfer of rural married women. The feature of the village and the education of offspring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 transfer” of rural married women.

Key words: Rural Married Women; Migrant Intention; Migrant Capacity